
中国民主化的内外环境

——几个问题群——

砂山幸雄

〈SUNAYAMA Yukio, 爱知大学〉

我作为本分组讨论的协调人想简单地评述一下“后伊拉克和中国的内外政治——围绕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的方法性难题”这个有点难以理解的题目的主要内容，和其中包含的可以预料的几个问题群。

经济成长和政治改革

1970年代末期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转换以来，不能不说与急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由它实现的经济快速成长相对照，在政治改革领域取得的成就很少。这个非对称性，不用说是基于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的基本动机，此中至少并存着两层意义上的悖论。

其中之一是，由此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得到正当化，成为延误面向民主化政治改革步伐的一个依据（或借口）。也就是政治的安定是经济快速增长不可缺少的前提，对它进行保证的正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现有政治体制的主张。1980年代，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拥有着素朴的经济发展引导政治民主化的期望，经过89年的天安门事件，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更加适合经济增长的需要的观点占了上风。天安门事件前夕，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倡的“新权威主义”——现在相对民主化，更重要的是通过给予开明领导人强大的权力推进中国的改革的主张——在当时受到了要求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激烈批判。但是，可以说90年代以后的中国指导层在默默地实践着这个方法。¹ 很多知识分子对其默认，或期待于既有体制框架内可能实行的限定性、微调式的改革（农村直接选举的实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活性化，缓和对媒体限制等），或坚定地认为经济发展带来的多样化价值观，多元化的利益终将不容置否地溶解现有体制，他们正以清醒的视光在“等待机会”。²

对于在中国国外观察中国政治的人来说，这种现状应该如何评价呢？在梦想中国实现自由选举的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同时，是否应该批判它和现实间的鸿沟呢？或者应该关注现实中发生的所有细微的实践从中感受走向民主中国的种种迹象并得到满足呢？亦或应该看到，无关善恶，正是在实际存在并延续的各种制度和发生的种种事情中才存在着可预示未来中国的因素，换句话说，是否应该认为比起体制变化来，中国的政治特色（人治的传统，重视国家统一等）更加重要呢？

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

另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作为经济增长原动力的全球化和看起来与之对抗的政治、文

化民族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平行发展。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要素是“开放”。以经济特区的设立为起点，中国经济开始与世界经济密切相连，从1992年正式认可市场化至2001年加入WTO为止，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得到了飞跃性的加强和巩固。现在中国经济的贸易依赖度要比日本大得多。中国今后要想维持高速增长，除了进一步全球化别无捷径可走。

但是，中国在天安门事件以后利用学校教育、电视节目、广告宣传、申办奥运和香港回归等各种各样的机会，展开系统性、综合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崩溃后的国际形势中，试图在政治上收紧，将代表权力正统性的意识形态从社会主义缓慢地移向爱国主义。可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在美国的对华强硬姿态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的刺激下不断高潮时，认为这只是体制一侧的操纵是很大的误解。我们应该看到，言论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的放宽，商业媒体和互联网的发达，城市中间阶层的扩大等——这些也是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产物——都在促进着大众的自发性爱国主义。当局控制这种大众民族主义越来越难。³ 此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民国家”建设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并强烈意识到中国尚未完成它的建设，虽然有理性的民族主义主张，但基本上听不到否定民族主义的声音。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些关于全球化的悖论呢。在中国国内，既有人主张全球化在政治、文化上都是促进世界一体化的事物，中国也必须与此世界主流合流，也有人与此相反，担心由于全球化导致的国内贫富差距、区域差距扩大进而中国被跨国资本支配，从而主张弘扬民族主义。还有人支持中国政府应将全球化局限于经济领域，尽可能地抑制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在此，我们也必须将这些主张对照中国社会的现实进行斟酌。

大国化和国际合作

但是，在这种悖论状况的同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也的确正在稳步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东亚地区已是政治、军事大国，可以说通过9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规模上中国已经的的确确是经济大国了。中国在将自己定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自认为是“一超多强”（一个超级大国和多个大国）中的一个大国。不能否认在此期间，中国的对外行动过于强调内政不干涉和主权的绝对性，而轻视与他国的协调和国际性共同利益。这也可以说是被要求发挥的大国的作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识之间的矛盾的表现。

冷战后，美国似乎用中国取代了苏联，视中国为潜在威胁。美国国内出现中国威胁论，频繁展开了关于遏制中国崛起应该采取的政策争论（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但对中国的大国化最敏感的大概是和中国在南沙群岛问题上有领土争议的东南亚各国。日本也因长期的不景气流行中国威胁论，每当发生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教科书问题时，“嫌中、反中”的感情就会高涨（不用说在中国国内“嫌日、反日论”也同样高涨）。

中国面临国际环境的恶化，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推行以“新安全观”为基础的新外交方针。新安全观是指仅仅依赖军事力量和军事同盟无法得到安全，还必须依靠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强调地区内的对话与合作的原则。它的成果就是确立与中亚各国进行合作的

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及署名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3年10月）等。中国的对美关系，虽然有驻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误炸”事件、对中强硬派的布什政府等较多障碍，却仍然非常耐心地寻求改善关系。在围绕伊拉克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上，中国一直隐身在法国、德国背后，正好说明了天安门事件后的国际逆境中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态度。胡锦涛新体制成立以后，在对日关系中出现主张搁置历史问题大胆改善对日关系的主张也决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是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安全观的转换而出现的行动的一环。⁴

但是，下述问题也应该予以解释。中国的国际合作外交的转换是否意味着更深层次的转换，也就是以古典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为特征的中国的国际政治观的转换？或者仅仅是到美国霸权走向衰退为止的——无论其时间长短——一时性战略？若是那样，具备了可与美国进行对抗的“综合国力”的中国将如何行事？同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应该如何对应中国外交的新转换？

我们再将目光投向中国国内，如同提出对日战略转换所引发的批判那样，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一定可以完全自由地游离于舆论之外。言论自由进一步扩大，政治改革越深入，舆论对现在为止只是政治家、外交家之专管事项的外交的影响力也越大。在此状况下，“战略性思考”能在何种程度上说服舆论呢？

最后不能不提到的是“后伊拉克”这个分组讨论会的定语。这是当初预测伊拉克战争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构造将更明显而使用的术语。在经济进一步的全球化，美国单边主义倾向进一步暴露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政治改革将如何进行是我们所关心的。但到现在为止，战后的状况和预测大相径庭。今后的世界是否向中国所期望的“多极”化发展并不确实，但至少可以说中国的选择余地多少得到了扩大。但即使仅仅如此，中国的国际合作外交路线的真正价值也一定会受到质疑。

1 Richard Baum 在其浩瀚的著书中，非常详细地解明了文化大革命后到1993年间，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如何经过共产党内的斗争而维持、发展。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94.

2 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分析了在快速增长的市场经济化中什么样的新的阶层得到诞生，然后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政治意识。

3 郑永年在分析最近中国的这种官方（official）民族主义和大众（popular）民族主义的复杂的相互关系。Zheng Yongnian,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9.

4 时殷弘在中美关系恶化的1990年代中期，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则和其对中国的启示〉短篇评论，提出对美协作的外交战略而受到注目（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则和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去年年末开始，“对日接近论”在中国国内的提倡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时殷弘也是主要提倡者之一。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